

心智赋能：稳固脱贫视域下高校实践育人体系的新探索——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

李建玲

贵州民族大学

DOI:10.32629/er.v3i6.2815

[摘要] 本文对贫困户脱贫后返贫风险点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结合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心智赋能是稳固脱贫成果、预防返贫风险的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赋能逻辑的高校实践育人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并以贵州民族大学扶贫实践为例,对这一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演绎,以期为做好脱贫攻坚后半篇文章提供对策建议。

[关键词] 赋能; 脱贫; 社会实践

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服务乡村振兴的总趋势下,致贫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不时向我们敲响警钟。2019年年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已脱贫人口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近200万存在返贫风险,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又给我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带来了极大挑战。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坚定脱贫信心、激发内生动力是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的重要前提。本文对当前贫困户脱贫后返贫风险点进行了剖析,结合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基于赋能逻辑的高校实践育人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并以贵州民族大学扶贫实践为例,对这一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演绎,以期为做好脱贫攻坚后半篇文章提供对策建议。

1 新形势下贫困户返贫风险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治理经历了消极救助到积极扶贫、开发扶贫到治理扶贫、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的三大转变,扶贫主体呈现多元化,治理主动性逐步增强^[1]。新形势下,“五个一批”是党和国家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开出的良方,这一脱贫举措为广大贫困人口带来巨大裨益,我国贫困治理也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数字化扶贫、军令状扶贫、扶贫机会成本等问题开始凸显,其中贫困户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引发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叶敬忠和贺聪志将“五个一批”归纳为生产扶贫、政策扶贫和兜底扶贫,明确指出这一揽子扶贫政策仍存在短视、脱轨等问题,尤其是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方式很难覆盖深度贫困的小农户^[2]。“五个一批”扶贫举措也更多地是强调外在责任,主要依靠政府和龙头企业等主体,贫困户自我脱贫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扶贫的可持续性和长效性^[3],返贫风险较大。这种被动脱贫极易引发扶贫对象的疲劳效应,难以实现主动“赋能”,造成贫困群众对政府支持和物质福利的刚性依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要扶志,有志气、自力更生很重要”。内生动力不足和“等靠要”一直是贫困群众致贫的关键原因。长期以来救济式扶贫让部分贫困群众产生了被救济的惯性思维,贫困小农户更是发展动力不足。笔者在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将近50%的被访者反映身边的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现象。不少扶贫干部也反映,昨天送去的种猪,今天就被杀来吃了。这种“兜底扶贫养懒汉”的社会现象,是国家扶贫政策的失效,不得不引起反思。

1.2 生计能力不足。生计是人们为了谋生所需要的能力、资源及从事的活动^[4]。当遭受压力或打击的情况下,人们仍保有谋生能力,这种生计才

是可持续性的。根据调研分析发现,当前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因素由低到高分别为因病、缺技术和因学。可见,导致贫困的主要成因是贫困群众的谋生手段受限,生计难以为继。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返乡青年失业、农产品滞销等问题凸显,贫困群众的谋生手段显得捉襟见肘,也成为当前贫困户脱贫后返贫的重要因素。

1.3 可持续性不强。当前产业扶贫或政策扶贫讲究规模化、标准化,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好说不好做”。这种政府主导型扶持极易受市场影响,波动性较大,“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就是典型负面示例。此外,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扶贫退潮后,由于缺乏谈判能力或专业知识,小农户在面对其他市场主体时,常常势单力薄,受到排挤,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2 返贫预防机制的核心要义：心智赋能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贫困人群脱贫后,国家仍坚持“扶上马送一程”的扶贫理念,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原有扶贫政策不变,留出缓冲期。但扶上马后,终须一别,这个时候贫困户如何拥有可持续的生计能力?关键还在于培养脱贫群众的“造血”功能,增强其独立脱贫致富的生存技能。“赋能”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企业管理词汇,意思是将更多的工作自主权交予员工,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控制权,从而更有效地工作。本研究认为要有效预防脱贫人口返贫,核心在于赋能,这要求改变以往行政式扶贫模式,转向授权赋能式扶贫,以充分激发和释放贫困群众的创造力。通过调研,本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是贵州贫困群众致贫的两大关键原因。据此,本研究认为要从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两个维度构建心智帮扶模型。

2.1 心理赋能,给予脱贫群众心理上的支持和力量,增强其脱贫的信心和决心。根据心理资本理论,心理资本是能够影响个体生产率特征,如自信、希望、乐观等,它反映了一个人的自我观点或自尊感,支配个人的动机和对工作的态度。扶贫工作者应该掌握帮助扶贫对象提升心理素质的方法和技术,引导他们以积极的情绪投入到脱贫工作中,从而激发他们的活力和激情。

2.2 智力赋能,给予脱贫群众思维、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与帮扶,增强其脱贫的效能感和能力。十九大指出,新时代扶贫要做到“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当前脱贫人口之所以返贫,除了老、弱、病、残、灾等客观原因外,主要还在于贫困户自身发展能力不足,所以要针对贫困地区知识体系薄弱、教育水平低下、自满心理明显、缺乏冒险精神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和教育,进而提升贫困户自身的发展能力。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多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发展落后,教育资源尤其匮乏,人民群众越贫穷、越文盲、越愚昧,越贫穷,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智

力赋能使个体通过教育、培训投资形成知识、技能与经验,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

3 基于赋能逻辑的心智帮扶实践: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均在这个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贵州民族大学实践育人体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线,整合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多种形式组织广大青年师生投身脱贫攻坚。通过对贵州民族大学服务脱贫攻坚战系列行动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其背后形成了基于赋能逻辑的心智帮扶体系,充分激发了扶贫对象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的胜任感、自主感和归属感。

3.1 激发胜任感。胜任感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学习行为或行动能够达到某个水平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某项活动,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相似。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自信心。根据心理学观点,个体所感受到的自我效能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会从事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或任务。自主脱贫是贫困人口跳出外在帮扶的舒适区,依靠自身能力实现脱贫。贵州民族大学瞄准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内在需求,以“扶志、扶智”为主线,把学校办到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例如,贵州民族大学与镇远县共建“乡村振兴学院”,依托高校教学和智力资源,青年教师和大学生通过政策宣讲、知识传授、技能培训等方式,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的自信心和效能感,特别是盘活了长期以来闲置未被充分利用的老年、妇女、残疾等劳动力。

3.2 激发自主感。自主需要由个体自己决定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表现为个体面对影响其行为的某种外部事件产生的压力时,个体进行自主选择程度,这种需要的满足最为重要。当个体在某个活动上的自我决定程度高时,他体验到的一种内部归因,感到能主宰自己的活动,此时其参与活动的内部动机就很高。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汉语言障碍是阻碍贫困群众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因素,进而削弱了其谋生自主性。基于这一因素,贵州民族大学依托全国大学生民汉双语志愿服务团,寒暑假推荐约90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贵州丹寨、从江、榕江、台江、威宁、盘州、镇宁、施秉、册亨、望谟等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展双语志愿服务,通过与服务对象结对帮扶、融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等方式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国家通用语言培训服务。

3.3 强化归属感。归属感是指个体需要来自周围环境或其他人的关爱、理解、支持,体验到归属感,主要表现为个体倾向通过社会关系而寻求别人的接纳。贵州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的省份,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工作,让搬迁群众能够“住得下,能致富”,直接影响脱贫攻坚成果的稳固性。贵州民族大学依托贵州省工青妇组织启动的“新市民追梦桥”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点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通过理论宣讲、结对帮扶、权益维护、文化宣贯等方式提升安置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总的来说,人类是积极的生物,生来就具有心理发展和自我决定的潜能,自我决定即是个体在充分认识其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前提下,对个体行为做出的自由选择,这种自我决定的潜能可以引导个体从事其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并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因此,如果社会环境支持并促进这三种需要的满足,那么人类的动机和天性就得到积极的发展,人类自身也能健康地成长。基于赋能逻辑的高校心智帮扶实践体系是从长远入手,旨在为贫困人口提高心理资本和生存技能,从而实现自主脱贫,这样的脱贫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同时,大学生通过参加精准扶贫工作实践,了解国家有关法律知识和扶贫政策,不断积累知识和阅历,为踏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基金项目:

2018-2019年度贵州省共青团研究课题《“心智帮扶”推进“精准扶贫”:贵州高校共青团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新探索》[黔青研20190202];2019年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三全育人背景下贵州高校“第二课堂”体系建设研究》[2019068]。

参考文献

- [1]李全利.扶贫治理的“四大陷阱”及现代化转向[J].甘肃社会科学,2018,(2):230-236.
- [2]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2):137-158.
- [3]杨晓莉.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返贫抑制问题分析[J].管理观察,2019,(24):81-83.
- [4]王海燕.贫困退出机制中贫困户返贫风险评估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030(005):147-148.

作者简介:

李建玲(1987—),女,汉族,四川广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应用心理学。